

書名：《中國詩歌研究史·漢代卷》

作者：趙敏俐

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4月

頁數：165頁

翻覽趙敏俐先生新著《中國詩歌研究史·漢代卷》，有一種補全十字狀拼圖軸心一塊之感。自趙先生個人學術道路的時間之橫軸觀之，本書是為其第五部關於漢代詩歌研究的專論著作。趙先生自博士論文《兩漢詩歌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初版；商務印書館，2011年再版）為起點，其後三十餘年間又有《漢代詩歌史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漢代樂府制度與歌詩研究》（商務印書館，2009）《中國詩歌通史·漢代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等重要論著與多篇單篇論文問世。趙先生始終將漢代詩歌研究作為個人最為重要的學術關注點之一而創獲頗豐，也始終立于漢代詩歌研究的最前沿地帶。而自對於整個20世紀學術研究做出“史”的總結之縱軸觀之，本書不僅屬於該叢書《中國詩歌研究史》之一環，同時，該叢書亦非孤立之作，而是互為補充的三項重大課題之一。以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領銜的由中國各地學者組成的學術團隊積十餘年之力，而先後撰成《中國詩歌通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中國詩歌研究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及《中國詩歌研究資料彙編》（即將出版）三部叢書。關於我國古典詩歌的20世紀前後的學術史、學術史名篇、學術新研，三者互為補充，共同構成了一代詩歌研究學人的學術總結。概因此兩方面，本書所述在歷史發生的時間與當下學術進程的時間中，瞻前與顧後，皆有源有流，故能夠給以長期關注漢代詩歌研究的讀者以前述的“十字中樞”之感。

“學術史”作為“史”的一種，自有其體式、有其法度，與一般論著筆走龍蛇的巨大自由度不同。類似“命題作文”的學術史寫作，決定其成敗高

下的評判標準中最首要而直觀的一點，當在其“體例”，亦即框架結構的安排取捨。

“體例”上做到邏輯清晰條理、內容翔實有序，自是一般學術論著寫作的追求，而對於“學術史”的寫作而言，則更是決定了其成敗與學術意義小大的關鍵所在。更重要的是，一部學術史是否恰當合宜地反映了一定範圍內學術發展的經驗及收穫、重點熱點及難點，乃至背後支配與影響了此一範圍內學術進程的動力與邏輯，以及寫作者是否將自己的撰著目的表達清楚，示以讀者新的視角與追問。一個優秀的範例是《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王瑤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王瑤先生去世後，在此基礎上後又有陳平原主編的《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二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其編撰很好地繼承了我國“第一部學術史”黃宗羲《明儒學案》的經驗，以典型學界人物為章，全書諸章之間結構獨立而邏輯貫連。同時緊緊圍繞自身所確定的反映學術研究的“現代化進程”這一學術追求開展論列。譬如，該書對章太炎此類採取傳統治學方法的學者便予以割捨，即使他取得了巨大的學術成就。

《中國詩歌研究史·漢代卷》在對於20世紀漢代詩歌研究史的結構、體系安排、內容取捨中則同樣精心而貫徹了著者個人的學術理念和追求。

首先，在章、節、段的佈局中皆採取了以典型問題或文本為珠、以時間為線，即以問題為統攝、以學術研究進程為順序的方式結構全篇。全書分為三大部分：一，漢樂府歌詩研究；二，漢代五言詩研究；三，前兩大熱點研究範疇之外的漢代四言詩、騷體詩與七言詩研究。在分節中，仍以問題為準。如漢樂府歌詩的研究，又分為樂府機構設立問題、西漢樂府三大樂歌研究、清商三調與大曲、具體篇目研究、綜合研究諸題。在分段中，同樣如此。始終圍繞某一學術問題的研究和交鋒為中心而展開。顯然，這樣的操作較之純粹編年體的以時間為順序與斷限的安排更為費力而顯得分散(比如這會將一位學者的不同著述散入不同章節之中)，但面對20世紀這個特殊的研究對象，選擇這一組織形式則是一種必要的取捨。

在古代中國，以人物為中心、以學派師承為線索的“學案體”很好地反映與

適應了學術尤其學派發展的實際情狀。而至於顛沛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 20 世紀中國，傳統的師承脈絡斷裂寥落，新式教育體制一直處於變動之中而尚未凝定成爲一種全社會的文化共識。學界主要思潮與傾向的形成，則不僅由學術自身發展的需求與邏輯而推動，更受著新的社會思潮與好尚，乃至具體時局的影響、衝擊甚至支配。因此，在對於 20 世紀的學術史的描述中，以學術問題爲中心的謀篇方式顯然得以更精準地反映一個時代學界的生態、呈現一時代的熱點。這亦是《明儒學案》“明宗旨”的旨歸在新的時代環境、課題下的新的呈現。

其次，在圍繞重要學術問題與論爭這個中心鋪展開來以“明宗旨”的基本構架與首要目標之外，本書並未將時代劃定、學科劃分、事實描述等立爲敘述的鐵門限，而是亦與《明儒學案》相通，以“別源流”作爲另一目標。力求明晰揭示某一問題所以產生的根源與歷史背景、在 20 世紀所面臨的新挑戰或新機遇、其背後實際推動運行的方法論與認識方式之爭，以呈現一問題之來龍與去脈。何以言此？筆者在此試舉書中之例以爲證。

第一，本書並不以 20 世紀作爲書中所敘時間的截然斷限，決不逾越，而是圍繞問題本身交待清楚其所以生成的歷史淵源，甚至對近二十年的一些相關學術新進展亦予以簡單概述。比如漢代樂府機構的設立時間及其職能，不能不從《漢書·禮樂志》《史記·樂書》及劉勰《文心雕龍》的記敘講起（頁 29）；又如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曹道衡、逯欽立、王運熙、王小盾等對於“相和”“清商三調”“大曲”諸概念的辨析，首先就是緊緊圍繞對於《宋書·樂志》《樂府詩集》等文獻中表述的闡釋開展的（頁 45）。20 世紀之前“前情”的梳理，是爲主體部分行文極必要的提示。又如在對於七言詩起源問題論爭的講述之後，本書隨即沿著對於這一問題的追索明確指出：學界所以關注七言這一文體起源的目的，顯然不止在於挖掘出一個於歷史中預設的、可能並不存在的準確“原點”，更重要的是發掘七言詩發展背後的內外動力與邏輯，探究七言詩何以後來居上成爲中國詩歌中又一流行的重要詩體。隨後書中介紹了葛曉音、馮勝利、趙敏俐等完全不同於以往研究思路而轉以漢語節奏與韻律爲研究切入點的最新成果（頁 154）。此處列舉的幾篇重要論文發表時間雖已屬 21 世紀，但

如若我們僅因時間的限定而對已經湧現的新的學術思路指導下取得的成果視而不見,將敘述止步於方法論轉型的“前夜”,則反顯迂腐僵硬,恰恰失卻了學術史書寫的提示學術增長點的意義。

第二,本書並不以現代學科劃分自限,而貫徹以問題為導向,以發現問題、描述問題和解決問題本身為追求。即使最為本格而典型的古典文學的研究,也即涵括與跨越了從傳統小學與文獻學、歷史學與社會學到文藝學與美學、哲學等等的諸多層面。而隨著學術本身的不斷推進,以及歷史年代越是趨於早期越是需要跨學科視野的事實,都要求我們跨越現代學科門類的界限而不斷尋求新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在本書中也較為鮮明地貫徹了這一取向。如前文所述,對於漢代五七言詩的發生發展及其詩體特質的研究,我們已經不能繞開如馮勝利教授等語言學家從語言學角度得出的新認識;又如對於《白狼歌》及“白狼語”的研究,相對於古典文學研究來說則更應算是語言學家的一份研究材料,然而我們必不能因此對於本就數量不多的漢代詩歌做出切割處理。此外,如在對於樂府歌詩與五七言詩的分野與分別研究中,本書明確指出二者的區別不僅在於生產方式、應用場合等方面的區別,更為根本之處在於漢代的詩歌與音樂開始分流這一重要事實。這一點不僅奠定了漢代詩歌與詩歌研究的基本格局,也使得漢代詩歌與先秦詩歌之間有了明確的時代區分,同樣,也是漢代詩歌之所以為後人所特別關注的重要原因之一。又如書中對於楊公驥先生對巾舞《公莫舞》之研究的鉤沉,尤為鮮明地向讀者展示了擴展研究視野與認知方式的意義。唯有認識到《公莫舞》這一文本所具有的戲劇劇本的性質,方能認識到其中文字“聲、辭雜寫”的狀態。如僅將其作為普通的文學文本而從句讀、文獻學方面下功夫,則可能永無得解之日。由此可見,本書在對於學術成果的取捨中堅持以問題為導向,不論學科,只要對於解決有關“漢代詩歌研究”問題有所裨益的研究成果都盡量加以吸納。如是,才真正構成了一部學術史而非“學科史”,達到了學術史寫作“準確揭示真正有價值的學術觀點與研究方法”(總序頁11)的目的。

第三,本書並不止步於對學術發展歷程史實的描述和概括,而始終力圖做出方法論與學術發展邏輯的梳理和歸納。在第三章關於西漢五言詩真偽問題

及與之相關的文人五言詩起源問題的論爭中，尤為鮮明地表現出了這一追求。書中通過梳理指出，自六朝及以下之人對於古詩十九首及蘇李詩等作者與時代問題多持謹慎的存而不論的態度，至於本書所述重點的 20 世紀，則是基於“西方新興的實證主義思潮與宋明以來的疑古之風的影響”（頁 72）才引發了對於漢代文人五言詩作者問題的大論爭。而深入問題本身細加分析，可以看到“否定派”所提出的種種問題與懷疑並未能真正推翻傳世記載之說法。但在對於這一學術問題的觀感上，顯然是“否定派”在 20 世紀的學術史中佔據了上風和關注。對此趙先生指出，其中不僅有著 20 世紀疑古思潮的巨大助推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在進化論思想與民間文學正統論的影響下，否定派構建了一個五言詩起源於文人五言詩發展的譜係，而肯定派在這方面卻沒有做出更大的理論貢獻。”有鑒於此，我們學術史的寫作便不能止步於正反兩派論點論據的概括，“認真地討論這種由否定派建構起來並在 20 世紀被人們廣泛接受的五言詩起源論，就顯得尤為重要。”（頁 88）通過對於以梁啟超等為代表的“否定派”所建構之“譜係”和對立一方的辯難等學術交鋒的梳理，趙先生進一步指出，“肯定與否定兩派表面看起來是對於歷史文獻的理解不同和所採信的證據不同。實質上還包括研究方法的不同和對歷史文獻的態度的不同”（頁 97）。誠然，對一時代的重要學術問題與發現做出勾勒本身，於一部學術史而言已可稱為合格之作。而讀者在此之上，更希望對於一時代學術進程的更深層次，即推動某一進程、引發某一論爭的動力，能夠有所揭示有所總結，而本書於此方面則可說確實滿足了更高的期待。

如上所言，本書在對於漢代詩歌研究的學術史之描述與總結中，始終追踵黃宗羲《明儒學案》的內在精神：一則，以問題為導向以明一時代學術的最主要創獲與論爭焦點之宗旨；一則，不立門限以求在更大的歷史時空、學術場域和更深層次中辨別學術發展的內外推動力與來龍去脈。此為學術史寫作“立於當下”一面的意義。

而本書所以在某些方面對於常規的充滿定制的學術史寫作方式選擇做出一種深化或突破，則也是在於重視學術史寫作“著眼未來”一面的意義。尤其對於人文學科而言，呈現學術史的過程，往往同時即是示出新的學術增長點的

過程,持續發力推動當下學術發展的過程。一面返本一面開新,學術史寫作便勾連起了學術研究的過去與未來,對過去的回望又化爲了對於後來者的鼓勵與殷殷期待。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博士後 楊傳召)